

李甦平 著

韩国儒学史

Hanguo Ruxue Shi

 人 民 出 版 社

Hanguo Ruxue Shi

韩国儒学史

李甦平 著

●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封面设计:周文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儒学史/李甦平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

ISBN 978-7-01-007835-9

I. 韩… II. 李… III. 韩国-思想史-研究-韩国 IV. B3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3176 号

韩国儒学史

HANGUO RUXUE SHI

李甦平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23.125

字数:54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7835-9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儒学作为一个学派在历史舞台的登场源于孔子(前 552—前 479),孔子对流传至当时的文化和思想进行了总结和体系化的创新,因此儒学形成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孔子以前。《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这个记载告诉我们,在孔子生活的公元前 6 世纪之时,君子所居住的九夷一带就是文化地带。而韩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古朝鲜就位于这九夷文化圈,同时,《论语》中的这段记录也说明了韩国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是何等的悠久和深厚!

关于儒学传入韩国的具体时间,迄今为止没有准确的记录。学界一般推测,早在三国时期随着汉字的传入,儒家的伦理意识也就自然而然地传入进来,而且与当时社会的规范制度实现折衷。372 年高句丽设立太学,百济古尔王(234—286)时期制定了沿袭《周礼》的中央官制,近肖古王(346—375)时期王仁将儒家经典传到了日本,并且 7 世纪中期新罗设立国学等一系列的事例都说明了三国时代儒家的制度、礼俗以及孝悌忠信的规范已经在社会上确立。到了统一新罗末期,儒学思想成为政治改革的思想基础。

高丽初期,随着由古代社会向中世社会的转换,儒家的制度和规范也得以确立。高丽太祖王建(877—943)的统治纲领《训要十条》中虽包含了佛教、道教以及民间的信仰,但尤其强调儒教的仁

政和王道主义。光宗九年(958)实施科举制,这就确立了儒家思想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地位,随之儒家的仪礼和学制也走向完备。金富弼(1075—1151)在儒家思想合理历史观的基础上编写了《三国史记》,标志着儒家思想在学问上已正式走向成熟。高丽时期虽然是儒、佛、道三家并存发展的时期,但其中儒学在统治理念、社会制度以及学问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儒学对韩国社会变革起决定作用的时期是丽末鲜初(高丽末期朝鲜初期),这一时期的主导力量士大夫们吸收了当时先进的思想——朱子学,并且实现了由贵族中心的中世社会向士大夫中心的近世社会的历史转换。

韩国儒学不仅注重纯粹的道德性,而且还追求实现这种道德性的现实制度以及力量的实践性,这是韩国儒学的特征。换言之,韩国儒学追求理想道德和现实实践的和谐发展。这一点在朝鲜时期的儒学中很鲜明地体现了出来。朝鲜士大夫们在实践儒教理念的过程中,将当时社会的问题点用朱子学的语言和理论来解释并克服,同时对朱子学进行了重新构成,发展成为朝鲜性理学。从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纯粹的哲学论争的异面也包含着许多政治性的矛盾和冲突。这与当时的官僚兼学者——士大夫主导朝鲜建国的事实不无相关。

17世纪初叶朝鲜经历了“壬辰倭乱”和“丙子战乱”,以此为契机实现了由勋旧派向士林派的政权交替,并且社会走向近世后期。这也促进了性理学理念实现社会制度化。当时的士林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克服“丙子战乱”造成的危机。作为这一时代课题的对策,北伐论产生了,而且在理念上也出现了朝鲜中华主义。但北伐论实际上并未实行,而且执权阶层也显现出了统治能力的不足和局限性,由此在思想上出现了多种潮流涌动。朝鲜后

期最大的学术论争——“湖洛”论争就是从对朱子心性论的探讨中引发的观点差异，而且在学术论争的背后也隐藏着执权势力——老论内部对国家运营方式的观念差异。湖派不承认政敌南人和少论，并且反对英祖的荡平政治。湖派的这种理念认为圣人与凡人从根本上相异，即所谓的“圣凡心不同论”，后来发展成“人物性异论”。相反，洛派对南人则相对温和，并且参与了荡平政治，他们的理论发展成为“圣凡心同论”以及“人物性同论”。洛派学者湛轩洪大容(1731—1783)更进一步提出“人物性均论”，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华夷一也”，认为应该积极吸取清朝的文化。这奠定了性理学向实学发展的基础。而茶山丁若镛(1762—1836)则比人物性异论者更强化人与物的差异，认为只有人具备道德性和自律性，并否定禽兽的道德性，将禽兽规定为从属于必然的自然法则的存在，从而将人与自然的世界分离。他主张这种脱道德化的自然是人类享有和利用的对象。在茶山这里，我们看到了传统儒学向近代的转化。

当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面对西方帝国主义与近代文明挑战时，会发挥得淋漓尽致。朝鲜社会发展到后期，胸怀儒学理念的知识人面对西方近代化的冲击，采取了斥邪卫正论、东道西器论、文明开化论等积极的应对方式，多方面探求和实践救国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也确立了新的儒学理论。华西学派内部产生了心说论争，对心展开了多样的考察。朴殷植(1859—1925)通过对阳明学的近代化解释来探索克服当时社会进化论的批判理论，这打开了韩国阳明学发展的新局面。而且斥邪卫正论在闵妃弑害事件(1895)以后发展为义兵运动，而1910年局员(朝鲜后期隶属于元帅府参谋部的官职)丧失后又发展为独立运动。曾任临时政府主席并在光复后为了建立统一政府而费尽心血的金九(1876—

1949)就是继承了柳麟锡(1842—1915)的学脉。

以上可以看出,韩国儒学是道德性和实践性、理想和现实的统一体,它作为韩国的传统思想得以确立和发展。最近韩国的知识阶层试图用传统儒学来解决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实现结合后引发的问题点,并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讨。也可以说韩国儒学正成为人们“今天的热门话题”。

纵观整个韩国儒学发展史,我们应该注意的一点是,韩国儒学思想的发展是在以中国为首的整个东亚的国际大环境中实现的,而且与国际局势也密切相关。14世纪末15世纪初从儒、佛、道交涉向儒学思维的转换是在元明交替期完成的。16世纪末17世纪初随着勋旧派向士林派的政权交替,大规模的“性理学社会制度化”实现了,而且这段时期也相当于中国的明清交替期、日本的江户幕府建立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儒学近代化转化的探索,在中国是清朝向民国的交替时期,在日本是明治维新后走向帝国主义的时期。因此研究韩国儒学,不仅要从韩国“内部”进行研究,同时也要从韩国“外部”研究,而且这是必需的。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认为李甦平教授的《韩国儒学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李教授在研究东亚儒学方面具有深厚的造诣,她的这本著作将韩国儒学的特征与中国儒学的发展联系起来,并且对从公元前1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期两千多年的韩国儒学发展史进行了客观、详尽的叙述。特别是将朝鲜时期代表儒学者的思想进行了一目了然的整理,并很好地说明了他们的思想特征。同时也对最能反映韩国儒学特征的“四端七情”论争和“湖洛”论争进行了单独、详细的阐述。正是通过这两场论争,韩国儒学发展到了一个更新、更高、更远的层次。

李甦平教授的这本《韩国儒学史》作为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

关于韩国儒学的著作,在学术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意义。我坚信,此著作一定会推动中国在韩国儒学方面的研究,同时也会对韩中学术交流做出重大的贡献。我衷心希望此书的出版能引起中国学界对韩国儒学的重视和关心,也期待着以后在中国会出现更多韩国儒学的研究成果。

我作为一名研究韩国儒学的教授,多年以来通过各种学术交流与李甦平教授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李甦平教授不仅对韩国儒学,而且对韩国的文化和思想也进行了多方面有力度的研究。她为了向中国学界介绍韩国儒学而进行了数十年不懈的努力,我对她的这种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再次向李甦平教授表示感谢!

韩国成均馆大学韩国哲学专业教授

崔英辰

韩国思想史学会会长

2006年10月29日

自序

当这部书稿完成之时，我也迈入了花甲之年。回首我的治学之路，不禁想到了20世纪苏联的英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的一句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以此为镜，检讨自己的生命轨迹，还算比较欣慰。

20世纪70年代，我在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工作。在那里我有幸得到了中国哲学的前辈——石峻（1916—1999）先生的教诲，他要我将中国、日本、韩国即东亚哲学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的专攻方向从中日哲学的交流与比较扩展为中日韩哲学的比较研究。其间，我撰写了《圣人与武士——中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比较》、《中国、日本、韩国实学比较》、《朱舜水》、《石田梅岩》、《东亚与和合——儒释道的一种诠释》等12部著作，并主编了《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韩国卷》、《韩国名人名著汉译丛书》、《文明对话丛书》等。这些成果是前辈老师和同辈同仁指导、帮助的结果，也是我几十年来努力精进的收获。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又有幸来到了专门从事东方哲学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东方哲学研究室，集中进行韩国哲学的研究。面对中国学术界还没有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韩国

儒学史方面书籍的境况,我感到有责任在这方面做点贡献。这是我撰写这部书的初衷。所以,这是一部中国人写给中国人看的书。为此,在写作过程中运用了中韩儒学比较的方法并注意到了中韩儒学的交流与相互作用。鉴于中国学者对韩国儒学元典资料掌握不足,我特意将韩国儒学史上的两次大论战——“四七论辩”和“湖洛论争”的重要资料放入本书中,以供对此有兴趣的学人参考研究。

我很荣幸地得到了韩国当代著名学者、韩国儒学学会前会长、韩国思想史学会会长、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崔英辰先生为本书撰写的“序”。在整个撰写过程中,从资料的提供到章节的安排,都得到了崔英辰教授真诚的帮助。为此,我向崔英辰教授表示真挚的谢意!另外,中国人民大学的张立文和姜日天两位教授及我的同事洪军博士主动为我提供资料,在韩国成均馆大学读博士课程的邢丽菊小姐多次为我查找韩文资料,我的学术诤友周贵华博士对拙著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的王铁军先生、赵新英小姐、曾卫东先生在书稿打印方面,孟繁红女士在制图方面给予我热忱帮助,在出版方面还得到了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方国根编审的鼎力相助。在此,一一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研究成果,且荣获韩国国际交流基金的出版资助。

李魁年

2007年3月30日

目 录

序	(1)
自序	(1)
绪 论	(1)
第一节 韩国儒学的品格和精神	(2)
第二节 韩国儒学对中国儒学的发展	(30)
第三节 韩国儒学对日本儒学的贡献	(44)
第一章 统一新罗前后的儒学(前 57—935 年)	(47)
第一节 高句丽、百济、新罗儒学	(47)
第二节 统一新罗时代的儒学	(56)
第二章 高丽儒学(918—1392 年)	(83)
第一节 高丽儒学大观	(83)
第二节 高丽太祖的《十训要》和崔承老《时务论》中的 儒学	(102)
第三节 牧隐李穡和圃隐郑梦周的儒学	(124)
第四节 三峰郑道传排佛的儒学	(168)
第五节 阳村权近以图解说的儒学	(190)
第三章 朝鲜前期儒学(1393—1637 年)	(215)

第一节	朝鲜儒学概观	(215)
第二节	花潭徐敬德唯气的儒学	(217)
第三节	退溪李滉主理的儒学	(254)
第四节	高峰奇大升理气混沦的儒学	(290)
第五节	栗谷李珣主气的儒学	(314)
第六节	牛溪成浑折衷的儒学	(352)
第七节	南溟曹植敬义的儒学	(371)
第四章	朝鲜后期儒学(1638—1860年)	(397)
第一节	沙溪金长生重礼学的儒学	(397)
第二节	尤庵宋时烈直的儒学	(424)
第三节	湖洛学者关于性的儒学	(446)
第四节	霞谷郑齐斗的阳明学	(468)
第五节	星湖李瀾经世致用的实学	(492)
第六节	湛轩洪大容的实心实学	(514)
第七节	茶山丁若鏞集大成的实学	(542)
第五章	近代儒学(1860—1945年)	(571)
第一节	近代儒学纵观	(571)
第二节	东学派以儒学为主的三教融合	(574)
第三节	朴殷植的“儒教求新论”	(587)
附录	韩国儒学史上的两次大论战	(598)
一、“四七”论辩		(598)
二、“湖洛”论争		(688)
参考书目		(717)
索引		(722)

绪 论

何谓韩国儒学？关于这个问题，一些对韩国历史和文化有着走马观花式了解的人认为，韩国儒学就是中国儒学的移植和翻版。此言误矣！

固然中国是儒学的发源地，儒学就是以孔子为首的儒者的学说及其思想的总汇。同时应该看到儒者的学说和思想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深化，随着时势的需求而丰富。由此，儒学才能够像一棵长青之树，像一条湍流不息的长河，永葆青春，永不枯竭。中国儒学就经历了先秦元典儒学、汉唐经学儒学、宋明新儒学（理学）和近代新学等不同的发展阶段，使中国儒学在变化和发展中，臻于成熟和完善。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因此这个规律也适用于韩国儒学。

诚然，韩国儒学最初是从中国传入的，相对于韩国的固有文化，这是一种异质文化。从中国输入的儒学在与韩国文化的结合中，凭借着韩国人细密的思维方式、精微的逻辑思辨、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儒学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带着韩国印记的儒学就不再是中国儒学，而是具有独立性的“韩国儒学”。诚如韩国学者尹丝淳对“韩国儒学”所下的定义。他说：“所谓儒学的固有性相当于儒学的根本性质，而它是随着时代而相对地、可变地形成和发展的。何况是受容于语言、风俗、艺术等其他异质文化之中，其变化的可能性更无须赘言。所谓韩国儒学，指的正是作为在韩国文化

中如此变化的儒学的特殊性即韩国的独立性。正是在所谓‘韩国的独立性’的意义上,韩国儒学是存在的。韩国人以特殊的思想能力继承并予以独立性发展的传统儒学,正是韩国儒学。”^①

要想真正了解何谓韩国儒学,首先就要了解韩国儒学的基本品格和精神。

第一节 韩国儒学的品格和精神

所谓韩国儒学的品格,是指韩国儒学的本质属性,也就是韩国儒学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以特殊、独特的形式表现出来,具体说就是重“气”、重“情”、重“实”。

一、韩国儒学的重“气”品格

笔者之所以说韩国儒学的特征之一是重“气”,这是与中国儒学相比较而言的。这里所说的重“气”,指的是东亚儒学中的“理气”范畴之“气”范畴。

在中国哲学中,首次讲“理气”的是北宋的程明道(颢)和程伊川(颐)兄弟。二程的思想稍有不同,程颢所谓理乃指生生之理,程颐所谓理则指气之所以然。然二程皆以理为宇宙中之最究竟者,亦可谓唯理论。也就是说二程在“理气”这对范畴中,认为“理”更加重要。所以程颢以天即是理,事物之自然而不易的常则,谓之天理。他说:“天者理也”,“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颐认为“理”实即阴阳之所以然,乃宇宙之究竟本根。他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

^① 尹丝淳:《韩国儒学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阳,道也”。所谓道即最根本之理。阴阳是气。气非是道,阴阳之所以方是道。程颐说:“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下的气,不足为本根,理(道)是形而上者,是究竟本根。二程重“理”的思想被朱熹加以发扬光大。

理气论之大成者是朱熹。朱子根据程颐之学说,加以扩大、充实,赋予丰富的内容,形成中国哲学中最缜密最有条理的本根论系统。朱子又名理为太极,阴阳之气乃太极所生,太极乃究竟本根。

朱子以为宇宙之内,有理气二者。气及其聚合而成的物是形而下者,理则是形而上者。朱子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理是物之究竟根本,故云生物之本;然仅理不能生物,必有气方能生物,故气是生物之具。理与气二者之中,理是根本,气是其次。朱子说:“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气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终为主。”理是究竟根本,气是其次。在宇宙未有气之先,理已实有。理是永存的,任何事物未有之前,其理皆已先有。朱子说:“有此理后方有此气。既有此气,然后此理有安顿处。大而天地,细而蝼蚁,其生皆是如此。……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无论,未有天地之时便已如此了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理是永久固存的,故不可以有无论。任何物在未有之前,其理皆已存在。不惟自然物如此;即在人事,亦是先有其理而后方有其事。在未有一切事物之前,只是理存在。有理则有气,

而一切物皆依次发生。朱子又说：“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从欲推其所以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在实际上有理即有气，谓理先气后，乃系在理论上推其所以来，则不得不说先有理。《语类》又载：“问先有理抑先有气？曰：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是有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理气未尝相离，然在理论上讲，不能不说理在先。

理虽较气为根本，然必有气，方能生出天地万物。自然界及人类之生成，皆有待于气。朱子说：“疑此气是依旁还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鸟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无形迹，它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理不能造作诸物，气方能凝聚以生成万物。有理无气，则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有理则有气，然必有气后方有物；无理固不能有物，只是理亦不能有物。此为宇宙本根之理，朱子又谓之太极。

太极指究竟极至之理。程颐谓物物各皆有理，又谓天下只一理。此天下一理之理，即朱子所谓太极。朱子说：“事事物物皆有个极，是道理之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极之义，正谓理之极至耳。”“太极者，如屋之有极，天之有极，到这里更没去处，理之极至者也”。太极是理之究竟极至者，为一切理之根本的大理，其余一切理皆含蕴于此理之中。理是所以或规律，太极便是究竟所以或根本规律。朱子所谓理又有道德标准之意，太极

便是最高的标准。朱子说：“太极只是个极好的道理。……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的表德。”太极亦即究竟至极之善。此太极是至高无上之体，是绝对的。朱子说：“太极只是个一而无对者。”一而无对即今所谓绝对。未有天地之前，太极先有。

朱子太极论之实在意义，即是认为最究竟的原则乃自然之究竟根本。这个究竟原则即朱子认为的在理论上应说理在气先，理即太极，太极在一切未有之先已独立固存。一切事物皆由此原则（理）而有，而此原则（理）又为事物之最高标准，为人类行为之最高准衡。所以，朱熹的宇宙本根学说可以说是理一元论。

朱熹的理一元论宇宙本根说在中国哲学中占据有重要的地位并发挥了显著的影响作用。这是因为中国自宋至清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有三个主要潮流。第一是唯理的潮流，始于程颐，大成于朱熹。朱子以后此派甚盛，但不曾再出过伟大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大家都是述朱而已。第二是主观唯心论的潮流，导源于程颢，成立于陆九渊，大成于王守仁。此派最盛的时期是在王氏以后。第三是唯气的潮流亦即唯物的潮流，始于张载，张子卒后其学不传，直到明代的王廷相和清初王夫之才加以发扬，颜元戴震的思想也是同一方向的发展。可以说北宋是三派同时发生的时代；南宋、元及明初是唯理派大盛的时期；明中叶至明末是主观唯心派大盛的时期；清代则是唯气派较盛的时期，但唯气论哲学终未得极致圆满的发展。^①

可见，中国儒学在“理气”范畴中，更加重视的是“理”，以“理”为宇宙本根，凸显了“理”的价值和功能。

^① 参见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7、51—64页。